

dent be moved or not? readers of our Accident Book asked this. Most police departments recommend moving vehicles out of the flow of traffic to help prevent secondary accidents and traffic jams. They also recommend you *not* move the vehicles if there has been a fatality or serious injury. Contact the police in your area for information. "Getting the oil out and 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 is a challenge, but I'd say we were doing it very well."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the subjects, write to: **ed to your needs.** After what size your

**GHOUT
WORLD**

ALI
Telephone

Printers that make Xerox-quality copies you the benefits of a computer. Helps you manage information. Getting side benefit: the same time.

beautiful e from on losses ons. a real challenge. Direct one way to do any more.



**U.S. News
& World Report**

XXXVI No. 18 May 7, 1998

News Magazine
entirely to National
Affairs

World Report, Inc.,
N.W., Washington, D.C.
rights reserved.

U.S. News & World Report (ISSN 0041-9021) is published weekly, except two issues combined into one at year-end, at \$22 per year. U.S. News & World Report, Inc., at 2300 N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37. Second Class postage paid at Washington, D.C., and at additional mailing offices.

POSTMASTERS: Send Form 3579 to U.S. News & World Report, P.O. Box 2624, Boulder, CO 80322.

记者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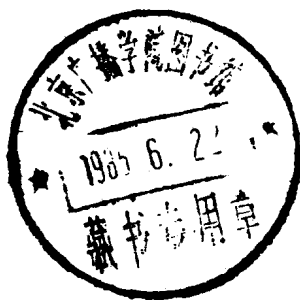
美 约翰·钱塞勒 著
沃尔特·米尔斯

Take: An estimated 1.5 billion dollars in tax revenue is kept by oil companies now and 1991. million dollars in tax revenue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5.1 billion dollars and 3.3 billion dollars—to be used to pay for security that the fund would pay for. The fund would pay for the security that the fund would pay for.

记者生涯

——现代美国新闻业务漫谈

〔美〕 约翰·钱塞勒 著
沃尔特·米尔斯
史文新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335076

我怎样学习当记者

南振中 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燕 山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插页2张 138,000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4,000册

统一书号：7203·130 定价：1.25元

序

当我阅读这本书稿的时候，从报纸上看到南振中同志获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的光荣称号，这消息既令人高兴，又发人深思。

去年秋末冬初，我应聘从北京到重庆给四川省新闻干部进修班讲课，南振中同志已经讲完课回山东去了。人走了一个多月，影响却随处可见。我一进教学楼，便看到墙报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南振中同志关于记者成才之路的精辟见解。学员们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些见解，写了不少心得体会。他们自动组织起来，整理南振中同志的讲课录音，分头复写装订成册。夜深人静，大雾弥天，我翻阅一笔一划的复写稿，深深被感动了。它凝聚着南振中的心血和学员们的心意啊！透过茫茫夜雾，我仿佛看见南振中同志顶着大雪在沂蒙山崎岖小路上攀登；冒着暴雨在鲁西北泥泞的乡村土路上行走；盘着腿坐在土炕上和老农民拉家常；忍着困倦在招待所冷清的台灯下笔走龙蛇，度过新春佳节之夜。《鱼水新篇》、《实践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女社员下地不再带针线筐箩了》、《政策牵动故乡情》、《从主宰到公仆》等在读者中

颇有影响的报道，确是他汗水和智慧的结晶。

南振中同志一九六四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同年八月到新华社山东分社作记者，一九八三年开始任山东分社社长，今年四十二岁，是目前新华社国内分社中最年轻的社长。他从一个不懂新闻工作的普通大学生，成长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奥秘何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相信本书的读者是不难作出自己的答案的。

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首先想到了人们常说的“树大根深”。我以为，从因果关系来说，也可以说“根深树大”，只有根扎得深，树才能长得大嘛！一个新闻工作者最怕扎不住根，象水上浮萍那样东飘西荡。现在，在有些记者中，存在着一种不好的倾向。他们不愿意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而是蜻蜓点水，浮在上层。采访农村的，不到田间、市场和农民家里，满足于在市、县机关看书面材料，在市、县招待所找人谈话。采访工厂的，不到车间、仓库、宿舍了解实际情况，往厂部办公室一坐，听听干部的介绍，拿走几份打印材料，就算“深入工厂”了。等而次之的，是只到上级机关，连工厂的门都不进，也自称“采访工厂”，照样写洋洋洒洒的报道，那样的报道，怎么能不肤浅呢？如果不解决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问题，要想写出在广大群众中有影响的报道，无异于南辕而北辙！

新闻工作者的根要扎在哪里？要扎在人民群众的深厚土壤里。南振中同志的根，扎在沂蒙山农民群众中，扎在山东大地上，从人民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根深叶茂，挺拔成材。

正因为他根扎得比较深，投身社会变革的大潮流之中，所以能敏锐地感受到现实生活中的新动向、新事物，在众说纷纭、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方向。在农业生产责任制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分歧相持不下的时候，他就旗帜鲜明地支持这场重大改革，写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又夜以继日地写出《农业生产责任制》一书。

正因为他根扎得比较深，所以写出的报道质朴深刻，亲切自然，真实感人，老百姓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为群众喜闻乐见。

正因为他根扎得比较深，所以能从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出发，打破新闻八股的框框，努力探索新的表现形式。

正因为他根扎得比较深，所以当新华社总社调他参加全国性重大报道的时候，他能把基层和全局联系起来思索，把以小见大和以大观小有机地结合起来，比较深刻地理解在祖国大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逐步学会在辽阔的地域范围内捕捉和表现重大的新闻主题。

正因为他根扎得比较深，所以当新华社总社派他访问南斯拉夫的时候，他能以自己的切身感受为基础，将国外的情况和国内的情况联系起来考虑，写出了一组针对性较强、引起国内读者共鸣的访南日记。

在人民群众中扎根，是记者成才的基础，栋梁之材是在深厚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我确信这是记者成才的一条重要规律。

徐占焜 1984年12月9日于北京

新闻记者——令人羡慕的“苦差事”

专职新闻记者产生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新闻记者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职业。

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许多革命领袖非常重视新闻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和编辑过十多种报刊。列宁也亲自领导过《浪潮》、《前进》、《无产者》等日报和《劳动》周刊的编辑工作。他主编的《火星报》曾经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俄国共产党（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代表履历表中有一个栏目是：“现在是哪个工会的会员呢？”列宁在这一栏里写着：“是新闻记者工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一九年就主编过《湘江评论》。这份四开四版的小型报纸设有“西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等栏目，其中有许多文章是毛泽东同志撰写的。《湘江评论》在当时受到广大革命青年和爱国人士的欢迎，许多有识之士把《湘江评论》比作“湘江的怒吼”，称赞它“真正代表人民说话”，对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

了很大的作用。周恩来同志曾经担任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和《觉悟》的领导人。恽代英同志曾经是武汉《学生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他们对于新闻事业是多么倾心。

在近代和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也都与新闻工作有缘。英国十八世纪四大著名小说家之一的笛福所写的《鲁滨逊漂流记》，不仅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至今仍是雅俗共赏的名篇。笛福在写这本小说之前，曾经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英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查理斯·狄更斯，出身贫苦，十二岁开始独立谋生，上过两、三年学，主要靠自学获得广博的知识。十六岁时他到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学会速记后，担任了报社的采访记者。他目睹了议会政治的肮脏内幕，从一八二八年到一八三六年，为伦敦几家报纸撰稿，是很有名气的新闻记者。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曾经担任过《萨马拉日报》新闻评述栏的编辑。《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尤利乌斯·伏契克，曾经担任过《创造》杂志的总编辑和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编辑。

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新闻工作在人们的生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新闻记者已经成为令人羡慕的社会职业。许多文科大学毕业生希望能分配到新闻单位工作。许多家长也希望给自己的子女在新闻界谋求一个职位。“新闻记者”象一块磁石，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吸引到新闻工作岗位上来。

可是，假若我们问这些年轻人：“你们为什么愿意当新

闻记者？”恐怕有相当一部分人回答不出来，有的甚至从来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在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学习时，曾经读过一本名叫《报人之路》的书，其中谈了这么一件事。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燕京大学新闻系举行新闻讨论周时，《大公报》的张季鸾因在外地旅行，未能应约参加。后来，他补写了一篇题为《新闻记者根本的根本》的新闻学论文，投寄燕京大学新闻系。在这篇文章中，张季鸾开宗明义地向新闻系的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想做新闻记者？为什么入新闻系？张季鸾认为在成为新闻记者之前，有两层必须觉悟：

“第一，或者有人想，做记者可以得到物质上优厚的享受，这是错误。中国经济发达以后，经营报业的人可以获利，但是单纯作一个记者，靠薪水吃饭，我想在二三十年内，恐怕很难有得到优厚酬报的。……所以从平凡而正当的途径上讲，做记者大概要一世穷。”

“第二，或者以为记者这种职业好玩，有兴趣，这话不假……不过诸君要知道，有兴趣的另一面，是格外劳苦。任何职业，办事时间都有一定，记者生活，独没有一定。而且夜间工作多，满天下的人类，都在黑甜乡的时候，新闻记者还拿着秃笔，写稿子，听电话……所以新闻记者生活的兴趣，只能是在紧张兴奋忽歌忽泣之中找兴趣，绝不是舒适享乐的生涯。”

张季鸾曾任《大公报》总编辑、总主笔，是一位著名的

资产阶级记者和报刊评论家。他的这些话不一定完全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但是，作为一个“老报人”，他的确道出了新闻记者的甘苦。

我是一九六四年在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的。宣布分配方案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班的班长在走廊里悄声对我说：“你的工作分得不错，是走南闯北的。”我叫他说得具体一点，他不肯说。回到宿舍，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是在捉摸“走南闯北”这四个字的含义。第二天一大早，中文系应届毕业的二百多名同学都集中到会议室。大家屏着气，静听着中文系负责同志宣布分配方案。当我听到自己被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时，心情非常激动。老师和同学也向我表示祝贺。教我们文学史的华钟彦教授还为我们题写了一首《满江红》：

“壮志凌云，驰天马、骠腾横逸。

当今日、干将出匣，荆山呈璧。

举世都称神异器，何人不重连城值？

但金锋玉瑱若为功，须人执。

说培养，由党力；论运用，凭才德。

要全心全意，听伊驱策。

事出丹心通万里，行从民望生双翼。

待明朝，展翅起高飞，知南北？”

我的辅导老师郭双城也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下这样两句格言：

“心中别有欢喜事，

向上应无快活人。”

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告别了母校，来到新华社山东分社，成为一名年轻的新闻记者。

“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我万万没有想到，辅导老师的这两句题词那么快就应验了。在新闻工作岗位上，我很快就尝到了它的艰辛。一些蒙在“新闻记者”这块牌子上的浪漫色彩渐渐退去，我越来越意识到，我将毕生从事的职业，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苦差事”。

新闻记者的“苦”

根据这些年来的切身体验，我觉得新闻记者的“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记者的生活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优哉游哉”，也不象人们传说的那样到处受人尊敬。记者“享福”的时候有，吃苦的时候也有，总地说来，采访生活是十分艰苦的。

一九六五年夏天，我到定陶县万福公社采访一所半耕半读的卫生学校。那时，从菏泽到万福公社不通汽车。我从菏泽县沙土集往南走，正赶上大雨。大平原上的路，没有明显的标志，加上雨下得天昏地暗，一道又一道的台田沟横在我的眼前。我迷了路，漫无目标地向前走着。天色渐晚，我有点发慌。忽然，发现了一排电线杆子。我想，电线肯定是通大集镇的，顺着电线走，说不定会找到公社驻地。我索性不去找“路”，沿着电线指引的方向，走了大半天，终于找到了万福公社。当我走进党委办公室时，已经成了一个“泥人”。记者要深入到生活的底层，要深入到山乡僻壤，而这

些地方往往是不通汽车的。不能因为有些地方上海牌小汽车和北京吉普进不去，就一生一世不去那里采访。遇到不靠公路的地方，就要步行，有时还要带着行李作“负重行军”。即使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尽管可以坐汽车，坐火车，但有时列车超员，车厢里人夹着人，一站几个钟头。每当这时，如果在车厢门口找到一小块空地，哪怕是在提包上稍坐一坐，也会觉得舒坦得不得了。

除了“走路”，还有“住宿”。有些地方的招待所，认“车”不认人。坐小卧车去的，食宿都好安排，骑自行车或步行去的，少不了要吃闭门羹。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到郛城县一个大队采访。八十多里土路，骑自行车走了三个多钟头，到了招待所，真成了“风尘仆仆”。我们想在招待所住一宿，休息休息。一位姓刘的所长从头到脚打量着我们，介绍信看了又看，最后说：“这里客满，没地方住了。”我们在县城找了好大一阵，才找到一个小旅馆，住了下来。我铺开稿纸，正要写稿，县委书记推门进来了。他听说来了两个记者，就到招待所去找。这位所长急了，到处打听，才从小旅馆里找到了我们。当着县委书记的面，刘所长显得格外热情，说：“还是搬到咱那里去住吧，后边还空着三排房子呢！”

“在咱那里，谈情况也方便。”记者就是这样，有时住高级宾馆，有时住车马大店；蚊子、臭虫，跳蚤，全都得学会对付。前些年到沂蒙山区采访，进一次山，一身虱子。采访归来，一进家门，家属就得帮助做“善后处理”。所以，要立志当一辈子记者，就要作好“吃苦”的思想准备。

第二，新闻记者不仅生活艰苦，而且思想也很艰苦：没有线索愁线索，有了线索愁采访，采来了素材愁写作。头一篇稿子刚交到打字室，又在思考下一篇稿子了。一年四季，白天黑夜，除了睡熟了的几个小时之外，思想没有空闲着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记者可说是“重脑力劳动者”。

第三，新闻记者要在家庭生活和物质享受方面做出牺牲。作为一个外勤记者，每年有大半年时间出发在外，把家当旅馆，旅馆当成家。逢年过节，别人都是合家团圆，新闻记者中的不少人却在第一线采访。我算了一下，从一九七二年到现在的十二年间，有十个“中秋节”是在外地度过的。一九八一年以来，有两个春节未能和家人团聚。许多新闻工作者都有这样的经历。

第四，生活上苦一点，思想上苦一点，如果能源源不断地出成果，也会感到快慰。但是，新闻作品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一个八级钳工可以保证不出废品；然而，即使有三四十年采写经验的新闻记者，也不敢保证自己写的稿子全都是成品。当辛辛苦苦写出来的稿子被“枪毙”了的时候，就会感到苦恼。

第五，稿子被采用就没有苦恼了吗？有时也还会带来苦恼。记者写的稿子，问题提得稍微尖锐一点，发表以后往往会引起激烈的争论，记者要为此承受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一九七九年一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中共山东省委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一些对实

际工作比较了解的同志告诉我，向农村派工作队的作法，同新形势不适应了。他们认为大批地向农村派工作队，有以下几个弊病：

一、不利于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派往县、社、队的工作队，进点时都宣布要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可是，进点以后，工作队的同志觉得自己是上级派来的，是来“运动”别人的，凡事要求地方同志按工作队的意见办；地方党委认为自己最了解下情，应该按自己的意见办，双方往往会闹矛盾，给农村工作造成许多损失。

二、容易搞瞎指挥。工作队的队长，有科级的，有处级的，还有厅局级的，来到农村，都是“大干部”，党支部自然而然地得听工作队的。但是，由于派出来的干部长期蹲机关，不了解下情，不熟悉生产，一些同志又放不下架子，不肯虚心向群众请教，往往下车伊始，搞瞎指挥。基层干部怕挨整，不愿得罪工作队，就是指挥错了，也不敢提意见，社员对这一点很不满意。

三、容易使运动“扩大化”。十多年来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好象工作队一进村，就要从政治上、经济上、作风上搞出点什么“名堂”。农村基层干部，工作干得多，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整一通，严重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四、为了把当年生产抓上去，工作队往往想尽各种办法到处采购化肥、农药，容易打乱正常的供销渠道，也加大了当年的生产成本。

我还研究了派工作队历史。解放初期，我们党要领导几亿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当时，农村政权刚刚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许多地方还不够健全。鉴于这种情况，各级党委从领导机关抽调干部，组织工作队下乡，包干负责一个地方的工作，这对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样的工作队，农民和基层干部是欢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农村的政治、经济组织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基层党组织普遍建立，战斗力不断增强。在新的形势下，如果继续沿袭过去那种大量派工作队的领导方法，社会效果是很不理想的。任何一种领导形式和领导方法，都是由一定的任务以及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主客观条件改变了，面临的任务改变了，领导形式和领导方法也应随之发生变化。基于这样的认识，当全国许多省、市、自治区忙着往下派工作队的时候，我写了一篇题为《还要不要大批地向农村派出工作队？》的“工作研究”，提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这篇稿件发表以后，在许多地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来信商榷，有的公开驳斥。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度非常苦恼。我想：当记者真难啊！科学家可以“研究”，为什么新闻记者就不可以“研究”呢？一篇“工作研究”，为什么会引来这么多的责难呢？后来，中共中央组织部办的《组工通讯》以《一个值得重视的建议：不要向农村大量派工作队》为题，全文发表了这篇工作研究，并在

文章之前加了一篇很长的评论；接着，从一些省、市、自治区也陆续传来了撤销工作队的消息。直到这时，我才渐渐从无端的烦恼中解脱出来。

毛泽东同志说过：“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新闻记者毕生都在报道最新的东西，而且要把新的问题尖锐地提到读者面前。当自己的见解一时不能被人们接受的时候，就会遇到压力，记者也会由此而感到苦恼。